

近代史研究

4

1981

目 录

(总第10期)

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张友渔(1)

历史与现实.....刘大年(8)

历史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丁守和 陈文桂 宋士堂(16)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郝维民 其其格(52)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肖一平 郭德宏(7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编成情况(续)

.....张国琦(88)

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

.....黄逸峰 姜铎(112)

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余绳武(135)

近代拉丁美洲的华工问题.....李春辉(143)

论郭嵩焘.....熊月之(169)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何迪 曹建林 翟卫华(184)

问题讨论

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蒋大椿(206)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钱远谔(232)

天京“内讧”毋须正名.....邹身诚(268)

书刊评介

读《俄国在满洲》新译本.....杨诗浩(271)

一九八〇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书目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275)

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

在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张 友 渔

中国史学会重新工作以来，已经一年多了。一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史学会开展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史学战线也和其他战线一样，在这一年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中国史学会理事会在这个时候集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很有意义的。趁此机会，我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的意见，主要是有关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的意见，谈一谈，请同志们指教。

一、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研究的是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好象同现实无关。但是它并不能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系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定阶段。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了解历史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的现状。因此，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的，所谓“鉴往知来”、“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历史研究。恩格斯在评论英国托马斯·卡莱尔所著《过去与现在》时，驳斥了他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示”的谬论，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

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不可阻挡的进步趋势，为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斗争。“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是说明未来的一切必将属于人民。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历史是和现实斗争紧密相联系的。

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强调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的重要性，他把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如果对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无所知，漆黑一团，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今天。研究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

研究历史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任何历史学家总要受时代的制约，总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他们所属阶级的要求。他们所写的历史著作总会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和孔子的《春秋》不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史记》又不同。但都反映了各自的时代的特点和阶级的要求。孟轲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说明孔子所以作春秋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特点，适应他所属的阶级的要求的。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显然也是为了他那个时代，反映他所属的阶级的要求的。司马光的历史著作命名为《资治通鉴》，更说明这是为当时的“治道”而作的。资产阶级的某些史学家标榜“纯客观”，其实他们的著作也无不受到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也无不是反映时代的特点和阶级的要求。他们的著作，并不真正客观，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彻底研究了人类社会状况，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从“历史的启示”中预见到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鼓舞无产阶级为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历史研究和政治的关系。去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一年来，许多同志就这个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们应当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影射史学，决不能借口政治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捏造历史；也不应搞实用主义，迎合时尚，随意叙述和解释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的要求剖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历史研究又不能脱离政治。人类的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部分，研究历史必然要联系到人类的政治活动，要给以适当的分析和评价，这就会反映出研究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而且，我们的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也要求各项工作，包括历史研究工作，与它协调一致。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较远，如某些考据性和纯属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这种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历史研究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即使是考据性的纯属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也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与政治发生一定的联系的。这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发展的促进者。历史学家是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来促进历史发展的。在我们今天，一个真诚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没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不关心国家社会的命运，不能不使自己的研究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同时也有利于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

二、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

打倒“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破除

迷信，开展历史研究，使历史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成绩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历史研究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历史科学的发展是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它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既要求有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要求对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革命的批判精神。为了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向一切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进行斗争。

我们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根据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提出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一百四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把一部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党的领导，摧毁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四人帮”这种歪曲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已经作过许多批判，今后还应当进一步肃清它们的影响。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有人竟然歪曲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质，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歪曲我国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也必须批判。

我们是主张解放思想的，但是，我们说的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它的目的是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以便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很明显，解放思想是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的。它正是维护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而决不是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凡是”束缚人们的思想，违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从右

的方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反对这两种倾向，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

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和贯彻双百方针相矛盾呢？当然不是。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方针，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不排斥百家争鸣，相反，通过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实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今后也还是要这样发展的。但是，允许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并不意味着允许有否定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自由。双百方针本身就包含有维护正确思想、批评错误思想的意思。所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贯彻双百方针并不矛盾。

现在，各条战线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加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百多年来，为了摸索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几经艰难险阻，直到五四运动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经过长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已经由历史作了结论。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根据这些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阐明四项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

三、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

上次史学代表大会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还要大力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

现在在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

切。个别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唯物主义不行了，只要能掌握史料，进行分类排比就可以了，无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些看法自然是错误的。

恩格斯说，马克思有两大贡献：一个是发现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秘密；一个是发现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贡献。列宁说，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和“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只有它，才使历史学破天荒第一次放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所以，要发展历史科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遵循马克思的理论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真理（但决不是穷尽真理），而遵循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应当向青年讲清这些基本道理。

我们强调学习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决不是轻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工作无疑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是不能写出真正有内容的科学著作的。但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还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历史运动的实际意义。这就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关于史料和理论观点的关系，有些古人也有所体会。例如，章学诚就说过：“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明人笔记中有讽刺当时读书人的故事：这个读书人讥笑那个读书人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那个读书人讥笑这个读书人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他们的历史观和我们的历史观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指出现象，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只有史料，不掌握理论，这样的历史研究只能是史料的堆积，看不出历史的内在联系，当然不是历史科学；只有所谓理论，不联系历史事实，不掌握丰富的史料，这样的理论只能是教条，这样的历史研

究同样也不可能是历史科学。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写出科学的历史著作。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工作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其中包括历史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在座的同志都是史学界的“宿学鸿儒”，对历史研究有丰富的经验，深刻地懂得理论指导的重要。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帮助青年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良好的学风。这对我国史学建设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现在，我们国家各条战线的形势都很好，我们的祖国各个方面都在欣欣向荣，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党中央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历史科学应当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作出贡献，用人类历史的知识 and 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循着历史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历史与现实

——在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上的发言

刘 大 年

历史研究工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十年动乱以前，学术、理论界流行的某些口号、说法，或者本身不明确，或者解释失当，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弄得相当狭窄。四人帮横行，任意涂抹事实，以谈论历史为名，行篡党窃国之实。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被说成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就是那样。因此，当我们说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的时候，有人怀疑、误解，是可以理解的，不足为奇。

历史包罗万象。它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要说出其中每件事与现实的联系，一则办不到，二则未必可取。只要它直接、间接对了解历史发展、重大斗争、当时的社会面貌或多或少有些意义，就值得研究。不然的话，我们会作茧自缚，窒息僵化，最后实际上取消研究工作。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否认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历史家如孔丘、司马迁、司马光、王夫之等人，他们之所以重视讲历史，是因为它能够“寓褒贬，别善恶”，辨明君君臣臣的秩序，“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近人梁启超、章太炎都主张，历史学应当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帮助后人掌握那些公理公例，以增进人们的幸福。胡适主张弄清楚一个字的古义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傅斯年说，研究历史并没有什么实在意义，不过是国家供养若干文人，做出几篇文章，给当权者的文治武功作些点缀。胡适、傅斯年因为都反对革命，都希望引导知识分子脱离

人民革命的现实，去粉饰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现实。以上各种观点、说法不同，归结到一点，为历史而历史，与现实无关的研究是没有的，区别只在于如何联系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坚守唯物主义，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绝对不许因现实的需要涂改事实。揠苗助长，削足适履，都要归结为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唯心论。四人帮破坏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讲研究历史应当结合现实需要。因噎废食，人会饿死。湖南民间有句话，蛇咬一口，三年怕鳝鱼。其实那种怕是不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从原则上讲，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在那种情况下面，期望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所要辨别清楚的，是科学真理到底在哪一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实为理所当然之事。现在的问题决不在于发明什么口号。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必须有中心，有基本目的。在今天，这个中心、这个目的，是要注重结合党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阐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清除唯心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用科学历史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推向前进。谁都知道，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偶然地、轻而易举地提出来的。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奋斗，不知多少人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得出这么几条经验，几条认识。它准确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炳炳皇皇，载在宪法上，列在党章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不可违反。论国是，它是我们最大的国是。历史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如果同十亿人民息息相关的这个根本现实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就值得大大怀疑了。谁都可以提出问题：究竟要这种研究干什么

么呢？

历史研究工作结合现实需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这样主张，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万古不变的教条，不得不遵守，而只因为它是科学，是研究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人所共知，用不着去重复。放下这面旗子，就等于从科学退回到愚昧。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不时兴了；中国至今似乎没有产生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师，是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更足以发挥人们的才能？对于这样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

马克思主义问世之日，就是科学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时。不久也就有人叫喊它“过时”了，以至被“消灭”了。如今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方面是亿万人正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群众运动；一方面在世界广大地区里，又是支配十几亿人口的社会生活制度。历史实践的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了，更没有被“消灭”，而是越来越显示它的科学性和旺盛生命力。不错，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论断、预料没有实现。道理很简单，他们是在作科学分析，一切要依据时间、环境、条件而定。只有星相家、占卜术不要环境、条件而宣布可以预知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出现的伟大论断，终于变成了现实，如果讲科学奇迹，没有比这更光辉的科学奇迹了！近百年的世界历史，是对“过时”论最有力的驳斥。研究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人抱怀疑态度，其原因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主观的原因：以前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陷，只注意抓住事物的本质，不顾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简单化，说理不足，乃至对待读者不平等。更差的是抬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片言只语，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用来代替事实论证。类此情形，在我自己写的东西里就可以找到。这当然没有说服力。简单化，抓住书本上某些词句代替论证，是因为缺少辩证法，缺少马克思主义。客观的原因：中国人讲历史，传统最为悠久，资料无比丰富。它的好处和坏处混同在一起。早在汉代，

司马谈就大有感慨，说儒生以六艺为法，而六艺的经传以千万数。人们“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最后是劳而少功。到了宋代，历史资料继续增加。司马光说，他对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感到很发愁，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正史”读完。从北宋到现在，资料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把解释经传、考证掌故当做基本学问。它们的价值怎样，严复在和西学相比以后，总结说：“一言以蔽之，曰无实”，“曰无用”。传统是一种习惯势力。好传统是好习惯，坏传统是坏习惯。我们的学术界，本来没有完全克服“一曰无实，二曰无用”的坏习惯。一有机会就又抬头了。不论主观、客观哪方面的原因，历史研究工作要前进，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存在了半个世纪。它已经做的和需要做的相比，相差甚远。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足、自满。但是由先驱者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应当得到充分肯定。“椎轮为大辂之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早已跨过“椎轮”创始阶段，正在搭起“大辂”的架子。我国历史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遵循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前进的，而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贯彻私有制社会的始终。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的地位，向来是被颠倒的，今天在开始再颠倒过来。旧史书汗牛充栋，从那上面只能见到一些朝代，一些人物，一些言论、主张，一场场血流成河战争、屠杀，一串串动人和不动人的故事，纷纷然，嘈嘈然，而不知道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第一次使我们对那一切理出一个头绪，认识它们的本质，这就是今天的情况。至于有没有公认的“大师”，那要看要求怎样，以及由谁人“公认”。用马克思主义来要求，所谓“大师”，总应该博大精深，著述最有科学性，创造性。博大宏富，不一定就合乎科学。汤因比写了那么多书，在西方被认为了不起的大师。他用“文化”作为历史主干，把世界历史编排为若干种文化一个接一个兴起衰落的历史，实在少有科学性。精密、精深是很可宝贵的。但也要区分在史料学上还是在

科学体系、观点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的研究成果，有比较深入、比较精密的，在个别问题上观点新颖。我们要接受那些遗产，从中吸取营养。但他们的工作，终究没有超出史科学。可以想象，他们如果赞成、或者来得及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可观得多的科学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成长，郭沫若、范文澜在不同程度上起过开创作用，说他们是大师，大多数人是承认的。科学研究，任何时候，总是少数人先攀登到某个高峰，多数人贡献出自己一定的份额，站在整个阶梯的不同层次上。他们就这样连成一个整体。孟轲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像鲁班那样最伟大的“梓匠”。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是他们传授下来的“规矩”。凡是认真努力照他们的规矩、绳墨，即照科学方法论行事的，固然不能个个都达到“巧”的程度，跻身大师之林，但总能产生一些新东西，推进本门科学。用陈旧的观点看待“学术”、“学问”，不肯抛弃那些一曰无实，二曰无用的东西，沉湎于繁琐主义，难免误尽自己，也贻误别人。所有这些，又都说明我们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是相反。

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研究如何联系现实需要，不好用三言两语草草陈述。这里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样直接相联系。

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时期合在一起，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三个前途，三种命运，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求必须作出选择。第一个前途，第一种命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变为殖民地。外国资产阶级拼命驱使中国走向这个前途，选择这种命运。他们一次又一次发动侵略，并与封建阶级、买办阶级相结合，统治我们的人民，发号施令。中国部分地区被暂时变成了殖民地。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不甘接受这种命运。外国侵略者所指望的中国全部殖民地化的前途，由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顽强的革命斗争所阻止了，到底没有实现。第二个前途，第二种命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变

中国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阶级为实现这个前途，取得这种命运，先后发起过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两次重大斗争。农民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创始者，但它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反帝反封建就是反对阻碍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两大敌人，农民就是这样的主力军。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编》最引人注意，他们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且提出了模仿资本主义的设想。义和团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它号召“灭洋”，把帝国主义统统驱逐出中国。但农民阶级的两次重大斗争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资产阶级为着实现这第二个前途，取得这第二种命运，先后发起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次重大斗争。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希望用自上而下的变法改良来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经过短短的一百天，就在顽固守旧派的反击下流血破产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参加者，深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国是正义的、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他们之中许多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第三个前途，第三种命运，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斗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前途，争取这种命运。帝国主义始终坚持反对中国走这个前途，但没有能够得逞；封建阶级始终反对，也没有能够得逞；买办阶级坚持反对，也没有能够得逞；它们联合起来，群起反对，尽了一切努力，最后都终于没有得逞。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前途起了决定作用，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作用只有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成，只有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才能发挥出来，否则根本不会成功，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获得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历史对一百一十年大搏斗所作的最后裁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勇敢执行了这个裁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重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历史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

论。我们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必然地、无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某些人仿佛以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阶段，不过是一种偶然性，是无缘无故而来，或者是不费力气出现的；似乎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动摇。那种看法，不但是完全不懂得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性，而且也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懵然无知。简要地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据。历史既然是客观存在，不可改易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铁板着脚，同样不可改易的。

关于中国向何处的几种前途、几种命运的大搏斗，现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爱国者，对它是不能忘记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近代史正是讲爱国主义的头等重要教材。只要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如实地叙述事实，爱国主义就在其中了。不久以前《人民日报》关于《清华学生谈学习近代史的收获》的报导，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报导所介绍的学生学习的收获，处处都值得加圈加点，浓圈密点。例如他们说：“一个国家的公民爱自己的祖国是何等的重要！它是一个公民神圣的职责，是自己奋斗上进的动力，是一个公民的骄傲。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以中国近代史中的那些英雄，那些忠诚的人民为榜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发图强呢！”“中国近代史充满了中华民族的血和泪，使人感伤、悲愤；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充满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火和剑的历史，使人振奋、激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奋发图强，拿出我们前辈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富强，尽最大的努力”。“现在历史该我们这一代来写了，是‘爱国’，还是‘忘祖’，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能因为祖国贫穷就抛弃她吗？近代的中国是贫穷的，但近代中国那些英雄们并不因为她贫困就不爱她了……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的民族、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呢？我要为祖国、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等，等等。学生们许多话，发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立志发愤

图强的内心的声音，是我们民族的时代最强音。从青年一代身上展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前程。一切消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的正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它们的来龙去脉，就在中国近代史里面。

历史研究联系现实需要，如前面所说，范围广泛，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而又间接的。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各种专史，如何联系，只能从那个领域的实际出发。它必须是科学的，不是牵强附会的。四人帮的那种所谓与实际结合，要永远从历史研究中铲除掉。但不论哪个领域，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反对繁琐主义，要给人以科学的历史知识，给人以前进的力量，看到光明前途，要能够通过了解过去，更好地洞察未来，掌握今天的现实。